

中 国 文 学 论 丛



新文学大师的 选择

■ 黎舟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论丛

新文学大师的选择

黎 舟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大师的选择/黎舟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334-2660-6

I. 新… II. 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309 号

新文学大师的选择

黎 舟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11.625 印张 281 千字 2 插页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4-2660-6/I·163 定价:24.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早期新文学运动与外国文艺思潮流派	(1)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20)
——兼论鲁迅 1919 年至 1926 年的思想	
求教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	(37)
——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	
鲁迅论《毁灭》	(48)
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译介及其与中国革命文学的关系	
.....	(62)
鲁迅与巴罗哈	(79)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观点和理论	(88)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进程	(101)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	(111)
茅盾早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两个问题	(122)
茅盾与近代俄国文学	(137)
茅盾与近代法国文学的科学理性精神	(153)

茅盾处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历史轨迹·····	(167)
茅盾小说创作与现代主义·····	(181)
茅盾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199)
茅盾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218)
 “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231)
——论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译介	
“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247)
——论巴金的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不属于任何派别”·····	(261)
——论巴金与19、20世纪西方文学流派	
巴金与屠格涅夫·····	(276)
试论巴金对左拉的接受·····	(291)
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与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 ·····	(304)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有益尝试·····	(315)
——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茅盾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319)
茅盾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随想·····	(334)
巴金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346)
《域外千字散文选评》序·····	(359)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	(362)
社会主义文艺要有民族特色·····	(364)
 后记·····	(367)

早期新文学运动与外国文艺思潮流派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的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所决定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则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鲁迅曾经指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①。由于新文学运动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植根于本民族生活的土壤，它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必然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开始大变革的年代。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继兴起，使黑暗沉沉的中国大地透露了一线曙光。无论是对社会改革或文化革命，都必须具备对腐朽的旧制度、旧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思想武器，而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本身又不可能产生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拿来主义”的盛行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鲁迅曾经提到常见“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②的事例。他主张以汉唐时代的“开放”气魄，“放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②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引者按：指外来文化）尽量地吸收。”^①茅盾也说过，“过去的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民族的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了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②，“收纳新潮，脱离旧套”^③，吸取异域的营养，使旧机体重新萌发生命的活力，这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种带规律性现象。“五四”文学革命在外来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推动下所进行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具体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这一规律具有的普遍意义。

当20世纪初期中国封建旧文学处于僵死、腐朽的状态时，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的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社会意识的极度混乱，反映在文化领域则是形形色色的“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勃兴。“五四”时期继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量译介外国文化，又一次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当时，提倡封建复古的国粹派主张“闭关锁国”，完全排斥外来文化，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则鼓吹全盘西化，企图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对外国文艺思潮流派的介绍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进行的，面对“世纪末”文艺思潮在世界上的流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认为，“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④，主张对自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文学发展过程进行全面了解，并明确指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

① 《坟·看镜有感》。

②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③ 《坟·未有天才之前》。

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①。这正是“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在对待外国文学介绍上的具体体现。

在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将广泛介绍与重点借鉴和吸收结合起来，这是新文学运动初期对待外国文艺思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自1919年至1924年，出现了不少全面介绍欧洲近现代文艺思潮的论文、著作，大都是根据国外材料编译的，在具体评价上也难免有不当之处。但就它对于欧洲文艺思潮流派变化、发展的详细介绍来说，确实起了使人开阔眼界，认真思考新文学发展趋向的积极作用。而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来说，他们所作的“穷本溯源”的介绍又包含着从中进行比较、鉴别，然后作出抉择的主动性。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他们所处新的历史条件并具有先进的世界观相关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文化革命以“五四”为标志，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革命论”^②，文化革命就转而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指导。新文学运动初期，虽然还没有系统地介绍无产阶级文艺思潮，但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文艺现象，发表关于建立革命文学的见解。这个文学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必然在介绍外国文艺思潮上刻上自己的印记。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从实际出发，以“合乎我们社会与否”作为衡量外国文艺思潮流派，决定是否可以借鉴、吸收的准则。这种借鉴与吸收并不是依傍和模仿，而是伴随着“扬弃”和“改制”的

①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② 《新民主主义论》。

“取精用宏”，即“吸收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①，以创造出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位”的划时代的新文学为归宿。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先驱者大都处在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途中。他们尚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来阐明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在具体认识与评价上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而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性质，有着不同出身、经历和世界观的成员参加，所提倡的外国文艺思潮流派也不尽相同，不仅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而且“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都曾被一一引进。但是，并不是所有介绍进来的外国文艺思潮都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它们有的被吸收、溶化，有的仅昙花一现就很快地消失。历史对外来的文艺思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二

新文学运动初期，对外国文艺思潮流派的广泛介绍，是以现实主义为重点的。它所具有的对社会生活进行无情解剖与深刻批判的特征最适合中国革命与新文学发展的需要。梅林曾经指出，“在文学史上，凡属于上升阶级和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在自然和真实，在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样的战斗口号下向后者展开攻势，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一个没落阶级越是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就越是惊恐万状地紧紧抓住僵死的公式；而一个上升的阶级越是洋溢着生命的冲动和活力，就越是猛烈地冲击一切的束缚。对上升的阶级来说，它能够和希望的生活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就是自然和真实。”^① 在“五四”运动以前，作为没落阶级喉舌的中国封建旧文学，严重背离社会人生，宣扬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以“瞒和骗”来愚弄群众，成为进行思想革命的严重障碍。文学革命兴起以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从国外介绍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首先是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旧文学的，他们将介绍外国现实主义理论与作品当作对封建旧文学进行具体批判的一种锐利武器。

在中国，最早介绍并提倡现实主义的是《新青年》杂志。该刊主编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简略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潮由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至自然主义的变迁，使读者眼界为之一开。后来，他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明确提出：中国旧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坠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②。在《文学革命论》这篇声讨封建旧文学的战斗檄文中，他将“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反映“宇宙”、“人生”、“社会”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联系起来，更说明他们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1918年以前，在《新青年》上并未相应出现真正称得上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整个来说，他们提倡现实主义的收获是不大的。

“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鲁迅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更高地举起现实主义的旗帜。茅盾曾经指出：“明确而比较全面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在‘五四’时期才提出来的”，“那时候，主要是介绍了欧洲十九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的理论。”^③ 当时，鲁迅偏重于对具体作品的译介，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既从事翻译，又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介绍。他们在欧洲近代哲学、文艺

① 《略谈自然主义》，《梅林论文学》。

②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

③ 《夜读偶记》。

思潮变迁的广阔背景下，从科学方法的普及与德谟克拉西思想的盛行，阐明写实主义兴起的原因。但由于对写实主义与继写实主义而起的自然主义的界限尚未能划分清楚，他们所介绍的写实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包含有自然主义的因素。当时，他们在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对照和比较中，着重分析了写实主义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社会人生问题。欧洲写实主义作家打破了前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对理想追求的偏重，将目光移向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在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茅盾提到，“浪漫文学大都重艺术，写实文学重人生”^①，而“为人生”又是有特定内涵的，那就是为“下层社会”，亦即为平民的。胡愈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旧文艺的“最大病根，是太空洞，太不切人生，恰和写实主义相反背”，因此“今后最要紧的，便是翻译近代写实主义的代表著作；因为新兴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和我国文艺思想距离尚远，惟有写实文学可以救正以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文学的弊病。”^②

二、客观性与真实性。客观性是写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说注重社会人生是写实主义的出发点与题材范围，那么，客观性就是反映社会人生的态度问题。茅盾指出，与主观的浪漫主义文学相反，“写实是客观的文学”^③。胡愈之从欧洲写实主义文学的勃兴与当时科学精神高扬的关系，阐明了它注重“客观的冷静态度”的原因，并与“古典文学”、“浪漫文学”作了鲜明的对比，明确指出，浪漫派的作者是“他先有了主观的理想，然后搜集各种人物环境，来做表现这种理想的材料。写实派作者的态度，却完

①③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

② 《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全不同”；他们“把客观的人生真象，老老实实细细腻腻的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批评，自己去感慨，作者却并不参加些许的意见，也并不发舒些许的赞叹。”^①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真实性的强调。在他们看来，写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是建立在客观描写基础上的。茅盾在谈到“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时候明确指出：“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②

三、实地观察与生活体验。正因为写实主义以客观的冷静态度来描写社会人生，在创作之前就必须进行观察和体验，而不能单凭主观的想象。茅盾曾提到“浪漫是注重想象，写实是注重观察”^③。他还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为例，阐明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胡愈之也认为写实文学同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最要紧的是观察手段”^④。这些论述，对于搞“主观的向壁虚造”的封建旧文学，是有力的针砭。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⑤。新文学运动初期对欧洲写实主义作品的译介，则以俄罗斯与东北欧弱小民族的作品为重点。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⑥鲁迅说过，“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但在19

①④ 《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② 《文学与人生》，原载松江暑期演讲会《学术演讲录》第1期。

③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

⑤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⑥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世纪俄国作家中，也有在探究人生时“堕入神秘，沦于颓唐”^①的，如阿尔志跋绥夫、安特列夫等。当时对他们的作品的译介是经过严格选择的，着眼于是否具有社会意义，读者能否从中得到某种启示，而且在介绍时对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是进行严肃批判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欧的写实主义作品对中国新文学没有什么影响。在西欧诸国文学中，特别是对作为写实主义发源地的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当时还是相当多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欧洲写实主义文学单纯暴露社会黑暗而“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当时介绍者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们既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历史地位与长处，又意识到它“不过是文学进化历程中的一段路程，决不是文学的极则”^②。这虽然带有进化论的色彩，但也说明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文学最为理想。当时茅盾主张先要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加以提倡，这正是基于对它的长处与缺陷的全面认识。他们明确指出写实文学“能抨击矣，而不能解决。能揭破社会之黑幕矣，而不能放进未来社会之光明。故其结果，使人愤懑而不知所自处，而终至于消极失望，或者则趋于危险之思想”^③。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介绍写实主义时，还存在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忽视创作过程中的主观因素，那么，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在强调反映审美对象的客观真实性时，就比较重视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主观能动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所提倡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他们明确指出，文学创作“本来不能

① 《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

② 沈雁冰：《近代文学体系之研究》。

③ 沈雁冰：《〈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

专重客观，也不能专重主观。专重主观，其弊在不切实；专重客观，其弊在枯涩而乏轻灵活泼之致”，主张“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了”^①。这正体现了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真实与理想相结合的文学的追求和渴望。

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在有选择地接受欧洲写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文学“不能单单描写黑暗，而不究其最初最真的原因，不指示一条理想的光明的途径”^②，强调截取“社会和人生的断片”时，“至少必能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③，使“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④。特别是李大钊同志曾提出“为社会写实”的新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为“土壤根基”^⑤，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主张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要寄托理想，在揭露社会病根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出补救之道，指引光明的未来，这正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的现实主义在理论上与西欧写实主义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创作的主流而言，当时固然有些作品以“爱”和“美”作为补救人生缺陷的药方，多少削弱了在揭露黑暗时所具有的批判的锋芒，然而更有力的是那一批把希望寄托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劳动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反抗上，呼唤着对整个社会作革命的改造的创作。这也是与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

①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

② 《文艺谈》，《叶圣陶论创作》。

③ 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

④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周报》第103期。

⑤ 《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三

新文学运动初期在介绍写实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

在近代中国，最早从国外介绍浪漫主义文学的是鲁迅。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以启蒙主义者的姿态，在《摩罗诗力说》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殷切渴望在中国也能出现像拜伦、雪莱那样一批“精神界之战士”，来唤醒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群众。但鲁迅在异国大地上发出的战斗的呼声，当时还未能祖国的旷野上得到热烈的响应。

到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才与现实主义一样，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会引起重视，首先是与人们迫切要求全面、系统了解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发展程序有关的。茅盾曾经指出：“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所最留心研究的虽然是西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特别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然而为了钻研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的发展，对于浪漫主义诸大家的作品也是寄以颇大的兴趣和注意的。”^①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介绍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成为一时的风尚，最根本的，是出于发展中国浪漫主义新文学的迫切需要。“五四”时期，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姿态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与之相伴随的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思想，争取个性自由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这个狂风暴雨式的时代，出现一个汹涌澎湃、摧枯拉朽的浪漫主义文学势头并与现实主义一起成为早期新文学运动的主

① 《我们为什么喜爱雨果的作品》，《文艺报》1952年第4号。

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适合表现“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

新文学运动初期对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介绍是得到普遍关注的。不仅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社团热心介绍，而且提倡现实主义的作家也认为介绍浪漫主义是必要的。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茅盾虽着重介绍现实主义，但他也充分肯定浪漫主义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与积极作用，坚决反对那种将浪漫主义“唾弃到地”，而将写实文学“高抬到天”的形而上学错误倾向^①。他认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②。茅盾重视浪漫主义，显然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有关的。从他早期一度提倡新浪漫主义，主张文学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又能展现“隐伏在罪恶的下面”的“真善美”^③，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中体现鲜明的主观思想，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包含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在同时期文学研究会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有重主观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说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不是互相绝缘的。20年代中期，原来提倡浪漫主义的作家在理论倡导上都转向现实主义，这虽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对文学提出新要求这一客观原因，但多少也表现了对浪漫主义是否必要继续存在的怀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矫枉过正。至于20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后，浪漫主义不再与现实主义一起成为主潮，当然是由于严酷的斗争形势更需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致，但事实上在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不乏革命浪漫主义因素，而且在这之后，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仍

①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

②③ 《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

然鲜明地体现在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创作中。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创造社曾大力介绍过外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他们并不像持冷静务实态度的文学研究会那样，既全面、系统地研究欧洲文艺思潮而又有重点地进行介绍，而只是把目光注视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创造社作家似乎并不重视从理论上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本身进行详细的介绍，而是着重于对歌德、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作家具体作品的译介。创造社成员对浪漫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主观性是颇为赞同的。如他们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①，“而不是再现”^②，从重感情，重想象，提倡艺术形式上的自由创造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所给予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受欧洲写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文学研究会提出文艺应以“求真为唯一目的”^③，有了“真”，才有“美”、“善”，那么，受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创造社却强调“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④，“艺术家的信条是美即真即善”^⑤，表现了对作品形式上完美的高度重视。他们的重艺术，否定文学创作过程中直接以功利为动机，也正由此而来。当然，上述主张不免有其偏颇之处，但也必须看到，他们还是承认文学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并肯定作品完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这一点上，则又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相通。

如同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俄国和法国，欧洲诸国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也并非程度相同。郑伯奇认为：“……对创造社一些主要作家最有影响的，毋宁说是十九世纪初的

① 郭沫若：《文艺论集·文学的本质》。

② 郭沫若：《文艺论集·文艺的生产过程》。

③ 《文学与人生》，原载松江暑期演讲会《学术演讲录》第1期。

④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创造周报》第7期。

⑤ 成仿吾：《真的艺术家》，《创造周报》第27期。